

中共重庆 地方党史大事记

(1919.5——1949.11)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重庆出版社



中共重庆 地方党史大事记

(1919.5——1949.11)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重庆出版社

D235.713
L1

RAM 5/10/1

责任编辑 黄长军

封面设计 姚长辉

技术设计 郑汉生

中共重庆地方党史大事记

(1919.5—1949.11)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4.75 插页 4 字数 100 千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5366-1831-7/D·70

定价: 2.25元

前 言

重庆在很早以前便是长江上游重镇，为川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辟重庆为通商口岸，英、日、法、德、美等帝国主义势力相继侵入，民族工业也有所发展，重庆工人阶级随之诞生。重庆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革命思想易于传播。辛亥革命中，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对策应武昌起义，推翻清王朝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辛亥革命没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在重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盘剥有增无已，而四川特有的军阀防区制，更加加深了人民的苦难，阻碍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青年知识分子继续向国外和沿海地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共产主义思潮在重庆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重庆的革命先驱者们终于找到了党，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的实践。1922年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组织。在相当一段时期，团代党工作，发挥党组织的作用。1925年初，着手发展党员，1926年初建立第一个支部。2月，成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为全川党的统一领导机关。自那时起，广大党员和党外志士，人民群众一道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英勇奋斗，前赴后

继。党的组织屡扑屡起，逐渐成长壮大。经过20多年曲折艰辛的斗争，终于在1949年底，配合人民解放大军，迎来了重庆和全川的解放。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重庆地区的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可歌可泣，有着丰富的经验。

大革命时期，五卅运动带来的革命洪流涌进夔门，推动了重庆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实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共重庆地委还领导了泸顺起义。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浪潮，震撼巴渝大地。可是，当时党还处于幼年，缺乏经验，敌我力量相距悬殊。重庆地方军阀首领刘湘与蒋介石相勾结，制造“3·31”惨案，地委书记杨闇公等壮烈牺牲。大革命在四川重庆遭到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组织在曲折中奋斗、发展。1931年以前，四川省委在重庆领导了数十次武装起义，在市内进行了形式多样的英勇斗争。由于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王明路线错误的影响，这些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均告失败。党的各级组织屡遭破坏，先后有四任省委书记，一任川东特委书记，四任巴县县委，重庆市委书记和两届江巴中心县委的多数负责人，以及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光荣牺牲在重庆。到1935年初夏，重庆党组织全数遭受破坏。

一二九运动以后，在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重庆救国会的基础上，重庆党的组织重新建立，空前壮大。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在重庆，就近直接领导，重庆党组织健康成长，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贯彻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隐蔽精干”政策，实行“三勤”，“三化”，在国民党

的历次反共高潮和不断的破坏高压中，保存了党的组织和骨干力量，在社会上立住了脚，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在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党组织进一步发展，配合解放战争，开展民主运动，投入第二条战线。但到1948年，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和《挺进报》破坏事件，使重庆党组织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总结经验，聚集力量，坚持战斗，恢复发展组织，贯彻“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最后迎来了重庆的解放。

《中共重庆地方党史大事记》就是反映重庆地方党组织在民主革命时期所走过的这一历史进程。

在编撰中，我们作了以下考虑和安排：

（一）《大事记》以重庆地方党史为主线，把现代革命史结合起来，从五四运动开始，对重庆建党前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以及以后各个时期与党史有关的重大革命活动均择要予以表述。

（二）鉴于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共中央南方局，1930年以前的各届四川省委和1946年公开的四川省委，以及历届川东特（临）委均该在重庆，重庆的党的工作几度由这些领导机关直接领导，或重庆市委由省、特委兼任，因而，对南方局，四川省委，川东特（临）委在重庆并与重庆直接有关的重要活动均作了表述。对国内外，党内外特别重大的事件，也作为历史背景予以反映。

（三）《大事记》按四个时期，即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来表述。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各个年代反映的份量却很不相同。这是由于党在各个时期，各个年代的工作发展本身

不平衡所致。

(四)在编写体例上，按时间顺序，对问题和事件采取适当集中叙述的方法，以免史料显得零乱。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大事记》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民主革命时期重庆地方党史的主要进程，说明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乃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目 录

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7—1937·7)..... (42)

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 (78)

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11)..... (112)

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

(1919.5—1927.7)

1919年

5月12日

《国民公报》首次披露北京“五四”运动消息，各界舆情激奋，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先导，立即奋起响应。

5月20日，川东师范、重庆联中、巴县中学等校学生代表五六十人集会，“痛陈时弊，谋振兴之法。”并决定致电联络京津各团体一致行动。

5月24日，各校学生代表再度集会，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发表《救国团宣言》和《哭告同胞书》，并通电全国，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川东一些县相继响应，成立学生救国团分部。6月28日，川东学生救国团改名川东学生联合会，并与北京、上海等地学联及川籍旅外学生建立联系。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川东学联是重庆和川东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织。川东学联主办的《川东学生周刊》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27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渝女师）学生“本匹夫有责之义”，发起组织“川东女子救国联合会”，宣称“密约不废，青岛不还，国权丧失，万劫不复。”表示“虽弱女子，岂可坐观国亡？”

6月3日，在川东学生救国团组织下，全市20所中小学校学生2000余人，响应北京学生的罢课宣言，举行游行警告大会，强烈要求还我青岛，惩办国贼，取消密约，抵制日货，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并到东川道尹公署和重庆镇守使署请愿，向全国发出通电。

6月12日，重庆总商会召集各商帮开特别会议，商讨提倡国货，一致对外事宜。在此前后，总商会曾多次拒绝日本驻渝领事提出的维持日货的要求。各商帮拒付对日本洋行领订货银30万两。苏货帮商定出抵制日货的具体办法，规定如查出私购日货，罚款10倍，并登报宣布为公敌。

6月14日，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这是以市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联合团体，规模较大，与川东学联配合，在“五四”运动初期，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6月22日

由商界和学界团体组成的“商学联合会”成立，宗旨是“提倡国货，维持现状，联络商学界一致进行。”主要任务是协调商学两界在抵制日货中的行动，协商处理违背约定、购销日货商人的事宜。商学联合会曾发挥积极作用，维系两界联合行动抵制日货坚持达两年之久。但学生与部分商人立场时有不合，以至发生过冲突。

9月中旬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入校学生100余人，来自川东20余县。这是上月成立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创办的学校。重庆商绅人士给予赞助，巴县地方亦给予补助。

次年7月学业结束，邓希贤（小平）、冉钧、周文楷（贡植）、傅汝霖、江泽民等84人，于8月27日起程离渝经上海赴法。在此前后，1919年11月下旬，江津、巴县、长寿、南充等地青年学生聂荣臻、帅本立、钟汝梅等35人经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帮助，由重庆起程赴法国。1920年11月，在广东留法学生、女律师郑毓秀的帮助下，巴县10名女青年赴法学习。

这批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有许多人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国后，有的回到四川、重庆，为中国革命和四川、重庆地区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9月下旬

重庆各码头工人拒绝给“联华轮”装卸日货。他们不理日本领事和巴县知事的交涉，表示：“因听学生演说我国受欺情形，愿与日商断绝交往。”部分码头工人在储奇门集会，表示以后不给日商轮船卸货。重庆工人开始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

11月17日

川东学联组织学生1000多人游行请愿，强烈要求重庆警察厅长郑贤书交出挪用公款廉价收购的80多箱日货。次日将查出的部分日货运至朝天门当众焚毁。四川地方当局被迫将

郑贤书撤职。

1920年

1月

巴县“青年进德会”在南岸成立，并发表宣言认为，在旧制度旧道德被抛弃，新制度新道德尚未确立之时，青年要组织团体来加强研究，互相勉励，以养成高尚的人格，洁净的品行；提倡思想进取而不保守，行为正当，向新的方向努力向前，日进高明；主张依靠青年自己的力量而不靠政府来组织公共事业、发展自己的意志。该会同时吸收女会员。

这一时期，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种社会团体纷纷成立。较巴县青年进德会稍后成立的有“綦江青年砥砺会”（常在重庆活动），“以德、智、体、实业四项为宗旨，以造就个人完全人格为目的。”有主张“救生事业、法制改良、男女平等、农村改造、土地国有、种族同化”的“重庆社会教育团”，以及“巴县青年砥砺会”、“社会服务研究会”、“益社”等；也有“主张工会主义、合作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宣传克鲁泡特金主张”的“重庆平平学会”和宣传通过“同盟总罢工”，以“攻击一切强权”的“人声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还有各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和以“培养读书能力，研究世界学术”为宗旨的各种读书会。

这些团体以适应潮流，研究主义，进德修业为目的，都大力反对旧礼教、旧制度，积极发展学术事业，接触各种思潮，探讨人生道路，谋求改造社会。其中一些人由此逐步成

长，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走上革命道路。

4月21日

川东学联在新丰街复升恒商号清查出大批日货，运至城外焚毁，并将商号老板卓云程胸前书写“亡国奴”字样，游行示众。

学生与商人矛盾日益深化，以后在抄查日货过程中，双方多次发生武力冲突。苏货帮曾关门罢市，各家派人手持木棒，联合组织“保货队”。棉纱帮招雇力夫200人，组成“保货队”。部分商人另组“商界联合会”，与学生对抗，并要求地方当局以武力解散川东学联；保护自由购货；认为视学、教员管束学生不力，由商人将视学涂花脸游行。

知识舆论界多支持学生；商界多支持被抄商户；地方政府从中调解，偏向商人。

上半年

重庆熟毛（猪鬃）业工人在喻合林带领下联合罢工，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和不另招学徒。经过半年斗争，取得胜利，并建立重庆熟毛业工会，喻合林任会长。

与此同时，重庆总工会成立，亦以喻合林任会长。参加总工会的有各帮工团40多个单位。四川一些县也陆续成立县工会，接受重庆总工会领导。

重庆总工会成立后与学生团体互相配合，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对发展工人运动起了积极作用。总工会骨干成员中有的后来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镇压“二七”罢工的刽子手赵文华、奉吴佩孚命入川，饬令解散重庆总工

会。

9月

省二女师开办平民夜校，校长和教师均由学生担任。

在此之前，巴县农校办的平民学校和华英平民夜校已在南岸弹子石创设。这些平民学校都是面向社会，对贫苦民众开门，男女兼收。这是青年知识分子力图推广教育、改良社会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年底

少年中国学会重要成员陈愚生到重庆，应聘为东川道尹公署秘书长。在东川道尹叶茂林支持下，撤换一批把持各中等学校的顽固守旧校长，改任一批新人任重庆联中、川东师范、巴县中学等校校长，并聘请一批在外地受到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各校任教和讲学。积极改革教育，如推行白话文，支持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允许学生有选择教师自由等。这对冲破因循守旧的教育传统，传播新思潮、新文化，活跃学术空气起了积极作用。

1921年

2月1日

陈愚生等创办的《新蜀报》创刊，宗旨为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早期的《新蜀报》是重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

在此前后，一批进步报刊相继创办。主要有綦江青年砥砺会的《綦评》（1920年创刊，后改名为《綦民公论》，在重庆出版），重庆联中校友会的《友声》（1921年11月创刊），巴县砥砺青年会的《巴声》（1921年创刊），重庆联中益社的《渝江评论》（1921年创刊），重庆商学界的《商学半月刊》、陈愚生等主办的《渝社旬刊》，全川教育改进会的《教育改进社杂志》，重庆工界团体的《工务日报》，以及《平民日报》等。这些报刊以揭露和抨击黑暗势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有的已初步涉及到社会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团体人声社的《人声》和平平学会的《平平》，以及无政府主义文艺刊物《星星》也先后出版。无政府主义思潮在青年中曾有较大影响。外地的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亦传入重庆。各种政治、学术思想空前活跃。

4月

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吴玉章在重庆积极开展四川自治运动，以反对北洋军阀和军阀混战，并进行社会改革。3月，“全川自治联合会”在重庆总商会召开成立大会，100多个县均派代表参加。吴玉章宣布12条纲领，提出实行“职业的全民政治”、“直接的普遍选举”、“划一的编练民军”、“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发展实业”、“组织各种协社”、“制定保工法律”等主张，试图实现“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的总目标。15日，全川自治联合会在重庆召开第一次会议，吴玉章当选为国民委员会主席。

由于刘湘等军阀力图控制和利用自治联合会成为御用工

具，5月28日，吴玉章被迫将自治联合会迁往成都。不久即宣布解散。

5月

商学两界在查抄仇货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20日，川东学联组织学生查获德和恒、天锡生、天锡福、源吉庆等商号大批日货，分别运至夫子池、打枪坝焚毁。次日召开商学联合会议，发生斗殴。商学双方代表各有人受伤，事态扩大，各执一词，全市学校罢课，部分商人罢市。附近各县学校纷纷支持重庆学生，有的罢课，有的赶来重庆声援。后在各方人士调停下，举行“商学仲裁会议”，达成协议：四家商号罚款8000元；查实不是日货的发还销售；分别慰问双方受伤者，由商学联合会垫付学生受伤者医药费，官厅究办伤害学生肇事者，并议定了会后抵制日货处置办法。至6月初商学冲突乃告结束。

6月

川东学联总结商学冲突的经验教训，认为查禁仇货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民众知识浅陋，国家观念淡漠；只抵制仇货而未提倡国货，所以虽禁不止。他们提出新的工作方针，强调：实行乡村讲演，以振作民气；推广平民教育；提倡实业，提倡国货；改革风俗脱离旧有恶习；传播文化，建立书报社，组织出版物。

经商学联合会评议会商定，在对销售日货商人罚款余额中，拨出专款分别作为发展平民教育基金和建立国货贩卖部及调查国货生产情况。

7月至8月

利用暑假期间，东川道属教育研究会于7月25日开始，川东各县百余人参加。与此同时，举办学术讲演会，自由旁听。两个会均由从北京聘请的知名学者高一涵、陈启修、陶孟和等主讲。同时受聘来渝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黄日葵（二人均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亦到暑假学术讲演会讲演，他们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情况，并针对重庆青年身受封建势力严重束缚的现实，演讲了男女平等、社交公开、教育革新等问题，宣传进步思想，提倡革新精神，深受与会者欢迎。讲演会历时一月余，在重庆青年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暑期讲演会结束后，邓中夏支持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择师运动，至10月离渝。

10月21日

恽代英自武汉到重庆，将赴泸州主持川南师范教务。在渝期间，应邀到重庆联中和川东师范讲演，猛烈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军阀政府，指出国家和社会的希望在于青年，要靠青年争取未来，受到听众热烈欢迎。

1922年

1月29日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陈毅（1920年由成都留法预